

# 19 世纪“现实主义”的巴黎

——以巴尔扎克为例

陈晓兰

[摘要]19 世纪是巴黎城市发展的伟大世纪,也是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巅峰时期。政治动荡、工业革命、社会变迁、城市扩建所带来的万花筒般的城市景观和神秘的城市经验,与现实主义作家以历史学家、社会观察家、风俗史家、人类心灵的探密者、风景画家的自我身份和全面揭示社会现实的艺术使命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在 19 世纪巴黎历史的总体背景下,分析了巴尔扎克与巴黎的关系以及巴尔扎克再现巴黎的话语方式,认为存在着两个巴尔扎克:一个是过着典型的巴黎人生活的巴尔扎克,一个是内心与巴黎殊异并以先知式的姿态和话语形式审判巴黎的巴尔扎克,巴尔扎克结合都市探秘、旅行指南和权威宣言式的语言为复杂纷乱难以认知的巴黎定了性。

[关键词]现实主义文学;巴黎;巴尔扎克

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1)09—0187—06

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中西都市文学比较研究”(05JA750.47-99011)、上海市第三期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S301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晓兰(1963-),女,甘肃张掖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外文学关系。上海 200444

## 一、巴黎与文学现实主义

与其说,19 世纪那些生活于巴黎并以巴黎为创作中心的作家所再现的是法国的社会现实,毋宁说是对巴黎特殊的城市文化现实的体验之表现。毫无疑问,没有巴黎,便不可能有《红与黑》、《人间喜剧》、《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巴黎的秘密》、《情感教育》、《恶之花》以及左拉的一系列小说。很难想象,没有巴黎的 19 世纪法国文学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同样,没有一系列文学巨著将巴黎“话语化”、“秩序化”,历史与现实重叠的巨型巴黎又如何能够变成可认知的对象,并成为跨越时空、跨越国际和文化界线的“神话”?

巴黎是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法国文明的象征,而巴黎之外的其他地方,六边形国土上的外省,则是这个中心的蓄水池,是法国文化的基础。如同北京和上海不能等同于中国一样,巴黎也不能涵盖法国的全部。但是这个城市却“以其集中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生活的方式浓缩并表现了这个国家,它是一个世界之都,也是包法利夫人幻想的充满异国情调的他已之地,是我们在法国及外国小说中所看到的男男女女趋之若鹜的地方”。<sup>[1](P.1052)</sup>

在 19 世纪,巴黎也一直是法国作家认识法国整个社会现实的基点。

巴黎,作为一个聚落地,有着悠久的居住史,公元 4 世纪,人们开始用“巴黎”这个词指称这个地方。<sup>[2](P.25)</sup>与罗马的血缘关系和基督教的洗礼,使巴黎成为一座“帝国之城”和“基督教信仰之城”。随着 10 世纪欧洲的城市复兴,巴黎作为法国首都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12 世纪结束时,巴黎成为“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城市”,拥有 20 万人口,并且获得了一种“性别身份”——她被称为“城市中的女王”。<sup>[2](P.37)</sup>也正是从 12 世纪开始,产生了有关巴黎的种种传说和比喻,12 世纪初,有人将巴黎被比作“巴比伦”,辉煌但会成为过去,而道德的堕落则会导致毁灭的危险。<sup>[3](P.13)</sup>在以后的若干世纪,巴比伦、所多玛、蛾摩拉不断被用来表达对巴黎的不满、隐忧和批判。在文学家的笔下,巴黎如同一个千面神,不同的人赋予其不同的面貌。如同文艺复兴的英国人把伦敦视为特洛伊的翻版,12 世纪末的法国人也认为巴黎是特洛伊陷落后逃亡者的避难所。14 世纪初的一篇颂词将巴黎比喻为“所有城市的母亲和女儿”。<sup>[2](P.59)</sup>瘟疫、灾荒、王位争夺的血腥斗争和连年不断的战争打断了巴黎的历史发展。经过 16-17 世纪巴黎的再生与发展,巴黎变成了王权的驻地和人文主义的

中心。18世纪,巴黎作为一个“没有国王的城市”和启蒙运动的发祥地,迎来了最辉煌的历史时期,被誉为“光明之都”、“民主中心”和“新雅典”<sup>[2](P.167)</sup>，“世界的中心”，“宇宙的缩影”，“一个充满着奇迹、美丽、邪恶和荒唐的地方。”<sup>[2](P.138)</sup>

巴黎,作为决定法国命运之重大事件的发生地,作为人口最多、社会结构最为复杂的城市,一直就是法国文学中最具特殊意义的地方和背景。到19世纪,巴黎成为文学的主人公、中心主题和提出问题的出发点,成为政治、社会、文化思考的核心和作家认识社会、理解人类、评价国家的重要基点。19世纪的巴黎影响了作家的自我身份、文学观念,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学话语、叙事方式及美学观念。

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集中强化了巴黎作为法国唯一的权力中心的支配地位,社会事件频繁发生,政治制度频繁变动,阶级结构不断变更。1789、1830、1848年的革命与动乱使巴黎成为“革命的发动机”，“革命圣地”，同时也是“暴乱的载体”和“动乱的化身”，被称为“暴力、血腥屠杀和政治恐怖之都”，“蕴藏着政治恐怖的潘多拉魔盒”。<sup>[2](P.167)</sup>政治斗争的激荡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和严重的经济危机,动乱的革命激情使这座城市成为引人入胜的文化思考对象。正如法国文学史家皮埃尔·布吕奈尔所说：“面对这个动乱的世界,文学所作的反应是矛盾的”，有些怀念旧制度,有些逃避现实，“有的作家终于意识到自身卷入的惊人漩涡,力图理解和描绘他们的所见所闻;他们把文学导向‘现实主义’或者‘自然主义’”。<sup>[4](P.7)</sup>他们试图全面真实地再现这个时代公开的事件和隐藏的秘密、阴谋,辉煌、壮丽的景观及其背后阴暗的恐怖景象,影响公共社会和私人生活的所有因素,并试图发掘其历史根源。正如布吕奈尔说：“政治斗争的激荡,唤起了对‘历史’的热情,人们希求以过去解释现在。”<sup>[4](P.5)</sup>“艺术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染上了历史的色彩”。<sup>[4](P.41)</sup>作家强烈的历史意识催生了大量的历史小说,并赋予当代主题浓郁的历史色彩。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以15世纪的巴黎为背景,描写了旧巴黎的奇特怪诞、黑夜、怪物、巫术迫害、禁欲等等;《悲惨世界》不仅表现了小说中各类人物的家族、出生和命运的发展历史,而且通过大量的地形学描绘追溯巴黎城市变迁的历史,如对于人物出没或定居的地点如街区、街道、小水道的演变历史等等。而法国的工业化进程、巴黎的人口膨胀,19世纪50年代,不论是出于商业、运输的考虑,还是预防街垒战、显示帝国权威的政治需要,路易·波拿巴和豪斯曼以理性化、秩序化的理念

对巴黎都市空间的重建<sup>②</sup>都使巴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口结构的改变、社会的流动性以及空间的扩张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生态环境、公共卫生、住房危机、社会秩序、伦理道德、家庭观念以及国家权力在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重构中的控制等等问题,不仅强化了作者的历史意识,而且唤醒了一种环境、空间意识和地方感,在作家的思维意识中,产生了强烈的城市和乡村、巴黎与外省的地域分野。斯汤达、巴尔扎克、左拉、福楼拜都创作了外省场景与巴黎场景小说,表现外省与巴黎在地理、物质景观上的本质区别及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的对立,通过外省人对巴黎的向往以及在巴黎的冒险和个体的城市化过程,表现以巴黎为代表的占绝对优势的现代价值观念如何影响并代替了以乡村外省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念。这是一个政治上保守,经济上迅速发展的时期,是“新式人物、鼓动者、经营交易所、铁路和不动产的新暴发户的黄金时代”,<sup>[5](P.391)</sup>也是生机与死亡、圣徒与恶魔、财富与贫困、辉煌与破败、秩序与叛乱、斗争与颓废并存的时期。而巴黎,正是这一切对立因素的集合体。

置身于巴黎这个漩涡中的作家,渴望认识、把握并全面解释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他说见证的一切公共与私人事件。他们或者以回归大自然、回到中世纪的神秘主义来表示对于工业文明、城市化和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拒绝,或者以实际的行动介入政治斗争的漩涡,热切地投身到纷乱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他们渴望超越时间,达到永恒,试图通过文学展示流动的社会中某些永恒的价值。他们把自己看作当代历史学家、人类心灵的探密者、真理的探索者、道德家、人类的教师、社会正义的维护者、社会学家、风俗史家、侦探、医生……。他们所创作的“包罗万象”的现实主义小说如同万花筒般的大都市,都是政权更迭、政治观念、经济生产、社会结构、人口分类、种族与性别等问题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场”,记录了他们对于巴黎现实的体验和再构造,通过各种各样的隐喻表达了处于转型期的法国人的幻想与恐惧,描绘了大都市可见与不可见的、公开与隐秘的、凝固的物质形态和流动的精神体验。

## 二、巴尔扎克与巴黎

巴尔扎克创作于1829-1848年间的《人间喜剧》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正如茨威格所说:巴尔扎克“建筑起一个由他自己创造并在其中安置众多人物的世界”,“把虚无缥缈的猜测拔高为无可置疑的现实”,<sup>[6](P.3)</sup>“把洋洋大观的混乱现象改变成一个外观上秩序井然的体系”,<sup>[6](P.9)</sup>这

个由巴尔扎克重新组织并秩序化的包罗万象的话语体系,影响了当时及后世对 1789 - 1848 年间巴黎的历史、风俗时尚、地形、建筑及其精神特质的认知。

巴尔扎克在《19 世纪风俗研究》序言中说:“作者一面要描写人物,一面要描写这个国家,给外国人讲述法国最美丽的景致和主要的城市,确定 19 世纪新旧建筑物的情况,解释在 50 年间给予了家具、住宅一个特殊面貌的三种不同的制度。由于作者的苦心,人们在 1850 年或许知道第一帝国时代巴黎是怎么样的。考古学家可以从他知道圣约韩关卡的位置和现在完全毁坏了的附近市区的情况。在他的风俗史里面有从前在巴黎存在过的房子的考古学的描写。”<sup>[7](P.150)</sup>的确,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也一直是怀旧者重温 19 世纪前期巴黎的地方,重绘巴尔扎克的巴黎地图,寻访巴尔扎克居住过的地方和他小说中出现的街区、建筑,甚至成为现代旅游的一个构成部分,充分说明了话语、文化、文学想象的力量对于易变的真实城市的介入和影响。巴尔扎克所描绘的巴黎以及他的巴黎经验不仅影响了同时代人而且也影响了后世对于巴黎的想象和认知。正如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所说:作家通过语言表达他的独特经验,“使他的个人经验社会化和公开化”,而读者则“使这部分新的社会语言成为他个人的东西”,于是,“他的语言天地”和“他的生活”都发生了改变。正是由于一种共同的经验,即作者和读者都共同生活于期间的社会环境,使这种变化成为可能。<sup>[8](P.6)</sup>1850 年 8 月 8 日,51 岁的巴尔扎克去世,巴黎自发送葬的行列长达几条大街,巴尔扎克和《人间喜剧》以及他在巴黎居住过的地方、他以及他的人物出没的街道,为他举行的公共葬礼、他的安息地——巴黎拉雪兹神甫公墓,还有关于他的许多传说,都已经成为现实巴黎的组成部分。

巴尔扎克在为他的第一部巴黎场景小说集《十三人故事》所做的序言“19 世纪的巴黎新画卷”中指出:人们早已许诺要描写真正的、现实的巴黎,可是“这个万头攒动、细节难以捕捉的巴别塔在哪里?这个不断运动和喧嚣的城市、人类各种力量都达到最高强度的城市、芸芸众生的肩膀和一小撮人的智慧、迅猛的骚动和繁荣的文化轮流占据统治地位的城市,它在哪里?”他认为还不曾有谁“曾探问过这诺大城市的五脏六腑,如医生一般探测过它躯体上的伤口,如忏悔师一般探测过它灵魂上的伤痕”,“叙述过它的生活经历、道出过它的思想,解释过它的黄金或泥土的幻梦”,<sup>[9](P.3)</sup>而他将专心致志地完成这样的工作,他将描绘它的容颜,它的光芒四射和愚昧无知,它的

腐臭的小胡同和空气清新的河岸、古老习俗和新风气、等级制和平等思想、怀疑宗教和渴望信仰,描绘这个汇集了“激情、犯罪、天才、乐趣、珍饻美味、奢侈消闲、百般享乐、艺术和智慧的世界”。<sup>[9](P.4)</sup>巴尔扎克将巴黎视为一个有形体有思想的人,巴黎的人格化和拟人化是他再现巴黎时常用的修辞手法,巴黎也是他小说的主人公。卷轶浩繁的《人间喜剧》中除了“巴黎生活场景”中的 18 部小说外,“私人生活场景”中的《高老头》、《妇女研究》、《高布赛克》、《三十岁的女人》,“哲理研究”中的《驴皮记》等等也都以巴黎为中心,即使在乡村、外省生活场景小说中,巴黎也作为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或必要的元素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外省生活场景”中的《幻灭》、《欧也妮·葛朗台》和巴黎人在外省中的两部作品《大名鼎鼎的高迪萨尔》、《外省的诗神》等等。这些作品通过不断重复出现的标志性街道、特殊的区域、建筑物、豪宅、寄宿公寓以及出没在这些地方的成百上千的人们,再现了巴尔扎克所认知的巴黎,“保存”并“拯救”了这一历史时期在巴黎生活、冒险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经验。

巴尔扎克出生于 1799 年,1814 年,15 岁的巴尔扎克随全家从外省迁往巴黎,之后便一直生活在巴黎。在巴尔扎克生命的 50 年间,巴黎的变化规模虽然不能与 1850 - 1860 年间相比拟,但局部的改造、扩张从未停止。拿破仑统治时期制定了新的城市建设规划,扩建人行道和下水道,大建纪念碑、凯旋门,将街道编号,集中管理坟场和屠宰场等等。之后,复辟王朝试图将巴黎“皇家化”,变成天主教的中心,大肆修建教堂、到处树立国王塑像,“王权加圣坛”<sup>[2](P.203)</sup>是不满的巴黎人对这一时期巴黎的嘲讽。1830 年,巴黎波旁王朝的象征被摧毁,居住在杜伊勒宫中的路易 - 菲利浦上台,到 1848 年革命将他推翻,这是巴黎资产阶级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巴黎经历了政治动荡、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巴尔扎克见证了旧城市的改变、社会的瓦解、阶级间的沉浮流动、传统道德的崩溃、旧的社群解体、新的价值观念确立、解体的社会关系围绕着财产所有权和金钱观念重新聚合的历史时期。可以说,巴尔扎克本身及其文学创作都是巴黎的产物,包罗万象的巴黎为巴尔扎克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和灵感源泉,他在《论艺术家》中说:“某一天晚上,走在街心,或当清晨起身,或在狂欢作乐之际,巧逢一团热火触及这个脑门,这双手,这条舌头;顿时,一字唤起了一整套意念。从这些意念的滋长、发育和酝酿中,诞生了显露匕首的悲剧、富于色彩的画幅、线条分明的塑像、风

趣横溢喜剧。”<sup>[10](P.5)</sup> 巴黎刺激着他去思考,也激发了他写作的狂热,他的丰产和他的包罗万象的艺术世界在迄今为止的世界文坛上无人堪比。

巴尔扎克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典型的巴黎中产阶级式的,充满活力不断进取,摆脱不掉的虚荣心,渴望力量和荣誉,强烈的阶级身份意识,梦想着发大财,喜欢精美的物品,追求奢华的生活,把欠债变成家常便饭,把文学创作当作解决经济困境的手段等等。但是,作为作家的巴尔扎克,却试图在其小说中全面再现生活巴黎的物质与精神环境以及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芸芸众生,深刻揭示巴黎所代表的一种新型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毁灭性和悲剧性所在。生活中的巴尔扎克与文学家的巴尔扎克是一个矛盾的双面体,生活中他是典型的巴黎人,他视巴黎为自己的故乡,但在他的作品中,他的心似乎从未归属于这个城市。他对于他笔下的那些外省的外来者——拉斯蒂涅、吕西安等等在巴黎的冒险、幻灭、失败和堕落,既充满了同情性的理解又表现出极度的鄙夷。通过无数外来者成为巴黎人的历程,他表现了磁石般的巴黎吸引着法国人,像无法抵抗的漩流将它的居民卷入其中,改变他们的形体、情感、心理、价值观和精神气质。他深刻地意识到巴黎正改造着法国并重塑着法国人的性格,法国人已经成为“头脑轻浮”、“好动”、“喜爱变化”、“追求视觉快感”的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是荣誉和爱情,无耻和淫荡,法兰西为它的现代史付出了代价”。<sup>[10](P.21)</sup>

巴尔扎克试图全面表现这个“现代史”,他的小说堪称“总体艺术”,他将政治、经济、哲学、历史、风习、肖像、风景结合在一起,提供了法国大革命之后至1848年间的巴黎全景画。为了全面、完整、真实地展示巴黎的全貌,还原巴黎的街道、建筑和人,巴尔扎克的足迹遍布巴黎的大街小巷、古迹、遗址,他观察、访问、交谈、收集资料。观察家和侦探是巴尔扎克德自况,也是他小说中对于文人、学者、艺术家最常用的比喻。正如他在巴黎生活场景的开篇小说《行会头子费拉居斯》中所总结的那样:“有人从不昏昏噩噩地走路,他们仔细品味巴黎,准确无误地掌握了它的风貌,连它的一个小疣、一个小疙瘩,一块红斑,都了如指掌……无论他们感到巴黎愁容满面还是笑逐颜开,丑陋不堪还是如花似玉,生龙活虎还是死气沉沉,总之,他们觉得巴黎是一个活物。……他们对它的头脑、心脏和奇异的习俗都了如指掌。所以,他们也钟情于巴黎……对这些文人来说,在巴黎漫游,是高级的奢侈享受。”<sup>[9](P.7)</sup> 这种体验巴黎的方式也影响了巴尔扎克的文学叙述形式和话语形式。

### 三、都市探秘与先知式的“权威宣言”:为巴黎定性

巴尔扎克再现巴黎全景的使命和他体验巴黎的方式,决定了他小说的叙述方式,也影响了他的表述话语。他的巴黎小说结合兴盛于19世纪的都市探秘、旅行指南形式,揭开巴黎的秘密、控诉巴黎的罪恶,同时采用全知全能的叙述和一种先知式的权威话语,界定巴黎的本质。

在《高老头》中,拉斯蒂涅在巴黎的初步教育是通过他自己对于高老头隐秘生活的探知和无所不知的逃犯伏脱冷对巴黎本质的介绍完成的。在《行会头子费拉居斯》中,年轻的主人公,即王家卫队的军官奥居斯特·德·摩冷古,他像某些学者、思想家、诗人和花花公子一样,终日踟躅街头,在巴黎城垣之中搜寻飘浮不定的享乐机会。一天晚上,他心不在焉地走在街上,忽然发现他所暗恋的圣洁贵妇蹑手蹑脚地游荡在巴黎臭名昭著的街道上,他像警察追踪罪犯一样尾随着她到了一幢恶俗不堪、狭窄阴暗的房屋前。为了弄清楚这个女人不适当地到这一区域活动的秘密,他接连几天出没于这一地区观察、盯梢,他的好奇心和探秘行为招徕了杀身之祸。直到小说最后,谜底揭开,出入上流社会、品德高贵的女人其实是苦役犯的女儿,而隐姓埋名的苦役犯则是为了父爱而无所不为、无所不能的幕后“英雄”。巴尔扎克的许多小说采用这种探秘式的结构,表现公开与隐秘、仁爱与暴力、体面与堕落、高贵与卑贱、表面的平静与深不可测的阴谋交织在一起的双重生活。在《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中,外省人加佐纳勒为了一场官司从外省来到巴黎,投奔已成为名画家的表弟,不料表哥赴意大利旅游,他在巴黎滞留两年但毫无进展,巴黎的豪华住宅让他目瞪口呆、昂贵的开支让他心惊胆战,他恨透了巴黎,称它为“风湿病制造厂”<sup>[11](P.5)</sup>,是全法国最讨厌的地方。终于他在报纸上看到画家已回到巴黎,于是写信求告,画家决定带着表哥对巴黎的道德、政治、哲学、艺术来一个广泛的认识。这位风景画家和他的朋友毕西沃充当了导游的角色,他对加佐纳勒说:“巴黎是个应当学会演奏的乐器,只要在这里呆上十分钟,我就能给你上一堂课”。“在巴黎,无论好事坏事、正当不正当,什么都能办到。这里什么都能办成,什么都能办坏,什么都能重来”。<sup>[11](P.9)</sup> 而一个人只要了解了巴黎的精神,就无法在别处生活了。小说从某林荫道上的“巴黎咖啡馆”始到圣乔治街交际花的住处终,在这一天的时间里,画家带领着这个外省来的表哥到了巴黎歌剧院,看到一老一少两个女人,画家告诉表哥,从她们的装束他便知道小的是芭蕾舞演员,从八岁就开始跳舞,如今已

十三岁,眼睛不再天真无邪、脸色非常疲乏,两年以后,这个尤物要么是无价之宝,可以在人市上卖6万法郎,要么一文不值。接着他介绍了巴黎歌剧院演员的等级,她们无人问津的悲惨下场和获得成功后的权力与辉煌。之后,他们穿街走巷拜访了野心勃勃、殚思竭虑的报纸发行人,每年有4万利息收入的帽店老板向他们大谈帽子生易经,猛烈攻击法国民族在帽子上的保守。之后来到了旧货店,其丑无比的女老板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经历和她从收购的各种纪念物中所探知的主顾们的秘密,她告诉他们:在巴黎,没有什么人的幸福不是建立在债台高筑摇摇欲坠的基础之上的,表面上体面的女人骨子里异常贫困,人人为了情欲挥金如土。接着来到了意大利人街高利贷者家中,这是个一毛不拔冷漠无情的人,但只要估计有利可图便立刻热情高涨,他的住处华丽无比,有成百上千的小玩意儿,体现了巴黎市民的口味。在另一条街上的理发室,他们拜访了理发店老板,他曾经是国民自卫军上尉,得过勋章,在名字具有商业价值的巴黎,创立了自己的理发学派,他认为理发师必须猜透顾客的灵魂和脾性,要有魔鬼般的想象力,他让那些漂亮有风度的理发员上门服务,而自己则只为有身份的女人上门理发,他有自备马车和随身小厮,他赢得了批发零售头发的垄断权,出售不名誉的假药,一年的利息收入是3万法郎。出来后他们遇见了一位身材矮小、脸色苍白、眼睛忧郁、野心勃勃的画家,在巴黎,艺术家为了更快成名便借助时势的翅膀,这位画家也是某个体系的拥护者。接着,他们到了老神庙街算命太太阴暗怪异的巢穴,这个被死神遗忘了的丑老太婆将这个外省人的口味、习惯、性格、婚姻、来自何方、最近的官司等等一一道出,令他目瞪口呆。之后他们又到了协和桥北岸,政府的中心——议会大厦,艺术家们认为议会大厦是弥补剧院的不足,议员们只不过是些喜剧演员,他们的所谓公务也只是为了赚钱而演出。在这里他们见到了在《高老头》中出场的拉斯蒂涅,他如今已被皇帝封为伯爵,是法国贵族院议员,纽沁根的女婿,通过他他们了解了党派斗争和投票的内幕。外省人不由得感慨:“可怜的外省再渺小总还是个诚实的姑娘,而巴黎是个娼妓,贪得无厌,谎话连篇,象个演喜剧的戏子。”<sup>[11](P.71)</sup>他本来就对巴黎存有戒心,现在更是看不起它。黄昏时分,他们决定回柏林街画家的住处,路上遇见一位十年里翻来覆去只写一部长篇小说、眼高手低的文人,画家又介绍了巴黎文人的状况。在画家的住所,贵重家具和梳妆打扮用的成百上千个无用的东西让外省人惊呆了。不一会修脚师来访,他把自己的行当称为“形

体学”,他一边修脚,一边与画家大谈政治,他理想的国家是没有宗教,公民一律平等,消灭最高和最低,割掉贵族的脑袋,他认为在法国天才人物的待遇太优厚,因此他们的事业就是干掉几个伟人,教育别人做个普通公民。作者借此表达了自己对于阶级平等论者的态度。晚上六点,他们到胜利街女演员的住所,因为她与公诉人关系密切,是歌剧院的第一女主角,许多名人都是她的座上客,他们打算引诱她,果然一听这位外省人有数百万家财,便向他卖弄风情。晚上十一点半,他们来到了圣乔治街巴黎一交际花的住所,如同所有交际花一样,她是巴黎“政界生活和金融界生活的一种平衡物”,艺术家、文学家、记者、上院下院议员等都会到她这里来寻找欢乐,她是一个可以使外省的省长下台的人,她是决定外省人案件的关键所在。三天之后,画家告诉表哥参议院判他胜诉,而这位被巴黎震惊了外省人已经迷上了女演员,百依百顺地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送给了她,连律师费也付不起了,他现在知道了首都的威严以及资本的危害。

正如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所说:“编制德行和恶习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sup>[10](P.62)</sup>“呈现一幅同时汇集了大善与大恶的大都会所特有的风俗激发起来的嗜欲、恶习以及一切肆无忌惮的作为的画图。”<sup>[11](P.71)</sup>在巴黎场景小说中,巴尔扎克采用“先知式”的语言批判巴黎的道德堕落,并综合学术性的话语,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角度对巴黎的历史、风俗和本质精神进行深刻的理性分析,因此,他被称为“学者型”的作家。他常常采用全知叙述和权威的声音对巴黎的总体特征和本质予以盖棺论定式的界定。正如罗伯特·阿尔特(Robert Alter)所说:巴尔扎克,“是欧洲最会讲故事的人”,“他创造了一种文学神话使我们相信城市的重要性,并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巴黎的权威的指导,他对巴黎本质的表现采用的是一种权威式的宣言式的语言。‘巴黎是……,巴黎是……’是巴尔扎克常常采用的句法结构。”<sup>[12](P.8)</sup>譬如,“巴黎是一个美好的城市,适合于各种各样的秘密事”。<sup>[10](P.29)</sup>“巴黎确实地地道道的魔怪”,“巴黎一直是魔怪般的奇迹,是运动、器械和思维奇异的组合,是十万本小说描写的城市,是世界之都……巴黎是一个活物。每一个人、每一片房屋,都是这位高等级女细胞组织的一个细部。”<sup>[9](P.7)</sup>《行会头子费拉居斯》中的一切始于街道上的一次邂逅,在小说开端,巴尔扎克花了大量篇幅对巴黎街道予以总括性的界定:“正如一个人劣迹昭彰声名狼藉一样,巴黎的某些街道也很不光彩。……有高贵的大街,还算老实正派的大街,……还有专事凶杀

街道、比老迈年高的王太后还要古老的街道、令人肃然起敬的街道、一向清洁整齐的道路、一贯肮脏污秽的道路……总之,巴黎的大街具有人类的品格,以其不凡的风貌,使你自然而然形成某种看法,而且一旦形成,便无法改变”。“在巴黎的某些街道上,某些邂逅会酿成大祸。”<sup>[9](P.5-8)</sup>在《金眼女郎》中,巴尔扎克采用盖棺论定的宣言对巴黎的三个阶层予以界定:“巴黎市民的一般容貌,无疑应列为世界上集恐怖之大成的景象之一。有的苍白羸弱,有的面黄肌瘦,有的颜色黑紫,看上去丑陋不堪……在个人私利支配之下,一群群男男女女呼啸飞旋,死神前来收割,其频繁更胜于别处;然而又不断重新生出,密密麻麻,一如既往;人的面孔,歪歪斜斜,扭曲变形,每一个毛孔都流露出狡诈和贪欲,他们的头脑中正是塞满了这些毒素……每个人都身心疲惫,急切的贪欲给他们打上了无法磨灭的烙印。他们追求什么呢?一言以蔽之,金钱,或者享乐!”<sup>[9](P.307)</sup>“在巴黎,一切强烈的欲望可用虚荣二字来概括。”“在巴黎,各种欲望用两个词便可以概括:金钱与享乐”<sup>[9](P.319-320)</sup>。巴尔扎克通过对巴黎市民三个阶层的社会学分析揭示了巴黎的社会秩序。处于底层无产者——靠活动身体活命的工人、工匠,金钱引诱着他们拼命干活,精疲力尽,然后把一周的薪水花在酒店里,他们组成巴黎下层三十万的大军。他们向往的是使自己的子女进入上一层——成为小有产者,伙计、职员、办事员、文书,这构成了巴黎社会结构的第二层,他们仔细琢磨每一个有利可图之处,同样疲于奔命,私利和野心扭曲了他们的肌体和灵魂。而这一阶层所向往的“无非是国民自卫军的军刀、千篇一律的牛肉浓汤,拉雪兹神甫公墓的一块像样的位置,还有合法赚来的金钱。”<sup>[9](P.315)</sup>这自然而然引入了“这座地狱的第三层”,这是巴黎的腹部,城市的物质利益在这里消化。诉讼代理人、医生、公证人、律师、经纪人、银行家、大商人……这些人几乎全部在事务的重压下精疲力竭,巴黎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炼丹炉中被烤得干瘪萎缩,被卷进这个庞大机器的破碎体系中,拼命敛财,以便爬上更高的一层。这种结论式的总括是个体人物生活的环境,也是他们无法逃脱的法则和规律。巴尔扎克一方面表现每一位野心勃勃、不断行动的个体,他们变换不定的身份、光怪陆离的偶然事件、惊心动魄的冒险、错综复杂的阴谋诡计,不择手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动力,但同时又揭示了决定他们行动及其动机的社会法则,每一个人似乎都是极其主动的事端制造者,内心动荡不安,为了永不满足的欲望而行动,可是,每个人却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难以自持地受制于巴黎

这个大机器的控制。

纵观巴尔扎克的小说,他想象世界中的巴黎基本上是一幅“地狱”图景,这无可置疑地显示了他从基督教立场对巴黎所做的先知式的审判,正如他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所说:“我在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之下写作,那就是宗教和君主政体。”<sup>[10](P.65)</sup>同时,他也认为:“一个作家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应该持有固定的见解。”<sup>[9](P.102)</sup>巴尔扎克从道德和政治两方面否定了他无法摆脱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从他有关巴黎的指南式、宣言式话语,我们听到了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对于奢华的世俗城市的审判。

#### 注释:

①1800年时,巴黎人口75万,到了1840年,人口增加了两倍。仅1841-1846年5年间,就增加了12万。城市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改变。参见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世界文明史》(下),第267页,商务印书馆,1999。来自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和外省的移民以及学生、打短工的季节工人、旅游者等等流动人口占据了巴黎人口的一半,其中男性对于女性,青年多于男性,巴黎成为外来者冒险和自我实现的梦乡。

②拆毁市区25000座旧房,建造75000座新楼,新辟了95公里长的街道,9座新桥横跨塞纳河两岸,宽阔的林荫大道、大型广场、纪念性建筑、拱廊街以及豪华的资产阶级住宅的修建,巴黎变成了现代巴黎。参见郭华榕:《法兰西文化的魅力: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寻踪》,第282页,三联书店,1992。

#### 参考文献:

- [1] Priscilla Parkhurst Ferguson. "Is Paris France?" [J]. *The French Review*, Vol. 73, No. 6, 2000.
- [2] 科林·琼斯. 巴黎城市史[M]. 董小川译.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3] John West - Soobyed. *Images of the City in 19<sup>th</sup> - century France* [M]. Australia, Moorooka: Boombana publications,1998.
- [4] 皮埃尔·布吕奈尔. 19世纪法国文学史[M]. 郑克鲁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5] 皮埃尔·米盖尔. 法国史[M]. 蔡鸿滨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6] 斯蒂芬·茨威格巴尔扎克传[M]. 李金波,鲁效阳译.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委会编. 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0.
- [8]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M]. 薛鸿时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 [9] 巴尔扎克. 十三人故事[M]. 袁树仁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10] 王秋荣编. 巴尔扎克论文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11]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全集第15卷[M]. 何友齐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 [12] Robert Alter. *Imagined Cities: Urban Experience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Novel* [M]. Cambridg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收稿日期:2011-05-20 责任编辑 吴定勇